

诗集传 楚辞章句

朱熹·注

王逸·注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诗 集 传

朱 熹 / 注

楚 辞 章 句

王 逸 / 注

洪兴祖 / 补注

姜书阁 / 序说

夏祖尧 / 标点



岳麓书社

1989 / 长沙

标 点 夏祖尧
责任编辑 王德亚
封面设计 许康铭

诗 集 传
楚 辞 章 句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630,000 印张, 19.875 印数, 1——10,200

ISBN7—80520—184—6/I·102

定价: (平)6.10 元 (精)7.60 元

[湘岳89—1—9/10]

《诗经》、《楚辞》序说

姜書閣

《诗经》——原只称《诗》——和《楚辞》这两部古典名著，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不可不精研细读的书，是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人不可不通读的书；而对于一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研究什么学科的，都应该至少浏览并选读这两书的某些篇章，从中吸取一些祖国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

《诗》三百篇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古籍中，向无真伪之争者，几乎是只此一种而已。其中的诗篇所跨越的时间是，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共五六百年；地区则包括号称“十五国风”的今陕、晋、鲁、豫、冀、鄂等六个省的全部或部分的广大疆域；内容涉及的范围尤广，除《大雅》三十一篇及《颂》四十篇属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庙堂歌诗，只有历史意义，很少涉及社会风情外，其他《风》诗一百六十篇和《小雅》七十四篇中的一部分，则广泛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便已深深地扎下根了。无疑，这不止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特点。

至于《楚辞》呢，就西汉后期刘向集为十六卷的专书而传至于今者来看，其第一至第七卷为屈原作品：《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当为全书的主要部分。自此以下，则收

宋玉的《九辩》、《招魂》和景差(或屈原)的《大招》各为一卷(即第八、九、十卷),皆屈原同时的后辈;再下则为汉人贾谊的《惜誓》(卷十一)、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卷十二)、东方朔的《七谏》(卷十三)、严忌的《哀时命》(卷十四)、王褒的《九怀》(卷十五)和刘向本人的《九叹》(卷十六)。今通行的王逸章句本则又加入逸自己的《九思》为后增的第十七卷。我们知道,依据《汉书·艺文志》,战国时的宋玉和汉代贾谊以下诸人,所作辞赋皆不止今《楚辞》所收那一篇(如贾谊七篇、淮南群臣四十四篇、庄夫子——即严忌二十四篇、王褒十六篇、刘向三十三篇),何以刘向皆各只辑入一篇呢?刘向虽没有说明,但从卷八至卷十六这九篇辞赋的内容看,特别是再看看王逸《章句》为每篇所作的题解(或曰小序),就知道这些篇都是依仿屈原《离骚》、《九章》之体写作骚辞以哀悯和伤悼屈原的。(如《惜誓》是:“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招隐士》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七谏》是: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其他皆类此,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整个这部《楚辞》主要是编集屈原的辞赋,而附入后人依其所创楚调骚辞而作的哀惜或追悯屈子的同类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楚辞》一书乃是集录中国古代第一位诗人屈原的诗歌(楚声骚体)别集(或专集),而附录后人对他的“哀挽”之辞。后人罕知此义,往往不能说明《楚辞》何以只选录汉人如此六篇,且其作者又不尽属楚,如贾谊为洛阳人,东方朔为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王褒为蜀资中人。即如朱熹所为《楚辞集注》即撤除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和王逸《九思》),而另加贾谊的《吊屈原文》(赋),与《离骚》不类,还加了贾谊的《鹏鸟赋》,则不独文体不类,并其内容亦与屈原毫无关系,是可证朱熹殊不知刘向所集《楚辞》之体例与本意

也。

如上所述,《诗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楚辞》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诗歌别集,也就是第一部作家个人的专集。那么,从体裁和内容看,二书有无后先承传关系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否则,我就不会强将二书捏合到一起来之序说了。

班固撰《汉书》,根据成帝时刘向及哀帝时向子歆校书中秘,卒业后,奏上之《七略》,“删其要”以为《艺文志》,其《诗赋略》“序诗赋为五种”:一、屈原赋家,二、陆贾赋家,三、孙卿赋家,四、杂赋家,五、歌诗家。这就是以屈原辞赋与歌诗并列,而为诗赋五种之一。所以他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意。……春秋之后,周道寢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侧隐古诗之义。”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也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辩骚》言之尤切:“自《风》、《雅》寢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正是说《诗》(《风》、《雅》)不作而《离骚》起,故曰“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言屈原继三百篇诗人之后,作《离骚》,为辞家之先导。又说“《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如“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言《离骚》“驷玉虬以乘翳”,便是从《易·乾卦·彖》辞“时乘六龙以御天”来的);而“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言《离骚》“遽吾道夫昆仑”,“忽吾行此流沙”,其地皆见于《尚书·禹贡》“禹敷土”之所及:“昆仑、析支、渠搜、西戎,……馀波入于流沙……”)。不特此也,即其“陈尧舜”,“称汤武”,“讥桀纣”,“伤羿浇”,乃至用“比兴之义”,著“忠怨之辞”,盖皆“同于《风》、《雅》者也”。故

刘氏的结论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刘氏在《明诗》篇中也说《诗》之为书“自商暨周，《雅》、《颂》圆满，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到了春秋之世，列国交往，陈诗观志，皆“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不再见有新赋的诗章，盖因“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于是诗衰。然而“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自亦是以屈子骚辞为继三百篇而起的楚声诗篇。后世论《诗经》与《楚辞》之渊源关系者，大抵皆不出斯义之外。如自元人祝尧之《古赋辨体》以至明吴讷之《文章辨体》和徐师曾之《文体明辨》，都认为《楚辞》为《诗》之变；《诗》虽无楚风，然列于二《南》的《汉广》、《江有汜》诸诗实皆楚地之风诗。其后《风》、《雅》既亡，乃有楚狂《风兮》（见《论语》）、孺子《沧浪》（见《孟子》）之歌，犹具诗‘六义’之比兴，但“稍变诗之本体，而以‘兮’字为读，遂为楚声之萌蘖。”“屈原后出，本‘诗义’以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世号‘楚辞’”，《楚辞》也便是收了以屈原的《离骚》以下共二十五篇辞赋为主的一部骚体诗（或称之为辞、为赋，皆只是广义的诗的一个别称）的别集或个人专集。

向来学者以为《诗·陈风·株林》当为三百篇中最迟的诗篇，而此篇必作于陈灵公为征舒射杀之年或其前一年，事在《左传》宣公九年，即公元前600年或前599年也。《楚辞》屈原《离骚》以下二十五篇之作，其最后作品当为《九章》中的《怀沙》和《惜往日》，皆在屈子投江的公元前277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二年，详见我的《先秦辞赋原论》页24—35，齐鲁书社1983年版）的夏五月间。由此以推，则《诗经》之诗其最迟者亦约早于《楚辞》屈原诸作三百年；而最早的西周初年之诗，则又将早于屈原骚辞约八百年了。所以仅就时间而论，在这三百年至八百年的长期间内，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度的高级阶段衰降到它为封建制度的初

级形态所代替，文学——特别是主要创自劳动人民的诗歌形式也必然要求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有所进步，不能总是用比较简单而少变的四言诗体。何况以地理论，西周以前，我国文化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基本上在北方，或者说在黄河流域。楚国越在江汉，其发展较迟，早期的楚文化自成体系，接受北方殷周文化的影响后，又有很快的发展。有些“楚产”的学者，“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文学，尤其诗歌，继承了《诗》三百篇，而仍保存了楚歌的形式与楚风的特点，迅速发展并创建完成了以屈原及其《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个体系，至汉又变化发展为辞赋、为大赋，“与诗画境”，终于以“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然其初固“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以上引语，均见《文心雕龙·诠赋》。）

以上论述了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过程及其演进的必然之故，意在说明《诗》、《骚》二者看似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两类文学作品，而深入细致地追究起来，却是同源异流，既一虑而二致，亦殊途而同归。但是，细心的读者如果不迷信成说，而敢于向古籍提出疑问的话，在反复多次通读了这两部古代文学名著，而且基本上能够体会各自的风格特征后，可能就会问道：《诗经》既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六百年间，东起东海之滨的齐，西至华岳之西的秦，地隔数千里，其诗的语言、音韵何以基本相近、相同，看不出多少前后之异与地域之差，甚至还有少数诗句之雷同；而相反的，《楚辞》的主体屈原作品二十五篇，既是一个人的作品，何以在形式上《天问》与《离骚》迥异，《九歌》与《九章》不同，甚且《九歌》的各歌之间，《九章》的各章之间，亦多有格调、结构乃至整篇形式的互异之处，如《九歌》的《国殇》便与《山鬼》、《河伯》，尤其是与《湘君》、《湘夫人》完全异调；而《九章》的《橘颂》又何以与其他八章没有多少相似

处呢？

对于上举的第一个问题，可以简单解答曰：《诗》三百篇皆合乐而掌于周王朝及各诸侯国之乐师——太师，庙堂乐歌《颂》和《大雅》本是为乐而作，不须特别收集，自然存于太师之府，代代相传，长期肄习，不虞亡佚；其它十五《国风》及《小雅》之出于下层士大夫者，则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乐师随时搜集其国内的民间歌谣而为之配乐，为了教习，因而得以传播，留存下来。在这长期采集配乐、传习过程中，尤其上于周王朝的太师以后，必然经过选择和整理、修改，以适应演奏时音律的要求，所以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被最后编订形成定本，以至流传于天下万国，为士大夫所世世诵读，其语言、音韵等便已逐渐趋于划一，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因时因地而形成的差别了。

对于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自己并不曾把自己仅仅看成一个诗人，当然也不以某一种文体的开创者自限。他是一个爱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所留下的二十五篇长篇诗歌——辞赋，既不是一时之作，又不是为了同一目的表达同一思想情志而作，所以无论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各篇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也可以说，篇各不同。象屈原这样千古一人的伟大天才诗人，其作品自然会异彩纷呈，各极其妙，而不可能是彼此雷同，如出一模的复制品，然而这二十五篇遗作却也有屈原所独具的统一的精神，而不能为古今任何后来的继承者所能摹仿到疑似程度的，那就是《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这虽然主要是指《离骚》说的，但此种精神也完全体现在所有二十五篇的屈赋之中。是故屈子之词，智盛而言博，才多而识远，精思要妙，文章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王逸《离骚章句

叙》语) 洵刘勰所谓“气往赅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辨骚》)者也。

《诗》三百篇，特别是其中的《国风》与《小雅》占全书百分之七八十的篇章，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的，无疑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根源，其影响于后世文学者至深且巨，固不待言。至若《楚辞》，其伟大的开山诗人作家屈原的以《离骚》为代表的二十五篇辞赋，则“托云龙，说迁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谲怪，不可尽纪；上下四方，西极流沙，周流乎天，见绝帝阍……诸如此类，虽其指意在于“以刺世事”，初非远于现实，然其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则是今所谓的浪漫主义，与《诗》三百篇之直刺现实者全然不同。这又是我们读《诗经》、《楚辞》这两部文学名著所不可不知的。

不管是《诗经》也好，《楚辞》也好，其中所收作品都是两千馀年乃至三千年前的古人遗作。不仅作者其人、其事，其时代、其社会，其作品所言的山川、地理、草木、鸟兽之名，对我们都是生疏的，不易理解的，即其诗篇所用的字、词，语言的音与义，也多与今天所通行的语言文字不同，难于通解。至若每篇诗歌的更深一层的涵义，则自来就有各家各派不同的解说，更不是一般读者所易知，因而也无需每个读者都去下功夫的。

作为“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任何一书，都必须选择适合于一般大学生文化水平的读者自学的本子，如《诗经》、《楚辞》，这样两三千年的古典诗辞，自然更要首先考虑选印最通行而又尽可能最完善的传注本，使自学者能够借助传注而基本上读得懂各篇的原文，领略其大意。

先秦古籍，经始皇焚烧，大抵均已散佚，惟《诗经》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语) 汉兴，鲁申培为《诗训故》二十五卷，是为《鲁故》，又有《鲁说》

二十八卷，在西汉时最先出，传授亦最广，至西晋而亡佚。齐辕固生曾为《诗》作传，景帝时立为博士，是称“齐诗”，《汉志》著录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至魏即均已亡佚。汉初燕人韩婴所传《韩故》三十六卷，又有《韩诗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世称“韩诗”。西晋时，韩诗尚存，但无传者，后亦寢微；南宋以还，亦佚失殆尽，仅存《韩诗外传》而已。总之，自西汉文、景之世，先后立于学官的传《诗》之家，号“鲁、齐、韩”三家，其故训传之书，至迟到南宋便已全佚不存。秦汉间人所为《诗》传之传至于今者，惟有西汉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一家而已。《汉志》著录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毛公其人，据东汉郑玄《诗谱》，以为鲁人大毛公，至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则以为毛亨；《后汉书·儒林传》则谓为毛长，《隋书·经籍志》又作毛萇。今人便综合这些不同说法，定为大毛公鲁人毛亨，以其诗学传于赵人小毛公毛萇。而王国维则更指出《毛诗》的“故训”当为大毛公亨作，而“传”则为小毛公萇所作（见《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一《书毛诗故训传后》）。自东汉以后，许多著名经学家皆治《毛诗》，郑玄又为之作《笺》，鲁、齐、韩三家诗遂渐不传而散亡，《毛诗》乃独盛。至唐孔颖达定《五经正义》、《诗》取《毛传》、《郑笺》，乃更为学者所尚。但是，自南宋朱熹作《诗集传》以后，乡塾授徒，大抵均用朱氏传，尤其明清科举，于《四书》限用朱注，朝廷崇儒，推尊朱子，于是《诗集传》几乎成为明清五百年法定的学童通用教科书了。《诗集传》虽亦杂采《毛传》、《郑笺》间用三家诗义，而取舍则断以己意，尤其是朱氏完全否定了《毛诗》的大、小《序》，破除了长期以来学《诗》者对于《毛诗序》的迷信，给人

们理解《诗》三百篇打开了封闭的大门，使人可以自寻研究蹊径。这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好作用。但是，他除掉不可避免地还受到很多封建思想的束缚，不可能完全正确地理解两千年前的优秀民歌以外，他也还有不少解释是出于主观臆断的，例如他把很多男女爱情之诗都说成是“淫声”或“淫奔之诗”。他在《郑风》之末注云：“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在他看来，仅郑、卫两国，就有“淫奔之诗”二十六篇，他认为孔子说的《诗》可以观，就是“观”此，最后叹曰：“岂不信哉！”我们则认为这些解释都是不足信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诗集传》于诗之用韵，多从吴棫的《毛诗补音》（今佚）及《韵补》（今存）之说，但不称之为古音，而皆冠之以“叶”，自明季焦竑倡为“古诗无叶音”之陈第本之作《毛诗古音考》，考得《三百篇》所用之韵，皆当时古音本如此读，非叶也。入清以后，顾炎武继之，作《诗本音》，益发明其说而证之，遂成定论。然而《诗集传》通行于山陬海隅，穷乡僻壤，塾师、秀才，固皆习而信之久矣，卒莫能改此“叶韵”之谬说。且朱熹《诗集传》所注之“叶”韵，亦非尽取自吴棫之书，即或取之吴书者，吴初不云“叶”，“叶”字乃是朱氏自加者。朱于音韵之学略无研究，所注叶音，至为混乱。钱大昕跋《韵补》曰：“《诗》‘外御其侮’，吴读谟逢切，朱不从吴氏，而读‘戎’为‘汝’以叶‘务’音。《驹虞》之‘虞’，朱于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红反’；‘谁谓女无家’，朱于前章叶音‘谷’，后章叶‘各空反’，皆吴氏所无，未可归咎于吴也。”良然。

虽然，《诗集传》之注，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还是比较简净明白，有可取处。但于上述各点，则不可不预为指出，希读者

注意，免为所误。

岳麓书社原定编印《诗经》、《楚辞》二书为“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之一册，问序于余。余初不闻其“文库”的整个计划，亦未见其预定的全目，仅略知此册已决定用朱熹一人的《诗集传》及《楚辞集注》，我当即提出意见，以为朱氏两书均有缺点，而《楚辞集注》为甚。盖其根本不知汉刘向所集屈原以后的汉人各篇的选录原则和用意，而妄加增删，并与所谓的宋玉、景差的作品（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同标名为《续离骚》，从而改变了自汉以来《楚辞》一书的整个面目。为此，我建议《楚辞》一书最好改取洪兴祖补注的王逸《楚辞章句》本，虽亦并非尽善尽美之作，至少较朱注差胜。它不仅基本上保存了刘向所纂集的《楚辞》原貌，而且所注音义也还较为详明有据，既切合初学者自学所需，也可作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至于“屈原赋二十五篇”的篇目问题，及《楚辞》中列为屈原、宋玉、景差的某些篇章的作者究竟属谁，自东汉王逸以来就有一些是“疑不能明”的，而明清近代争议尤多。对非专攻《楚辞》的一般读者来说，完全不必管它。且那些问题的其来龙去脉又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所能交代清楚的，这里就不介绍了。

岳麓书社嘱为《诗》、《骚》二书合订本写“前言”导读，自揣谫陋，不堪斯任，逊谢再三，未能辞免。爰杂著所见，题曰“序说”，聊以塞责。

一九八八年十月识于湘潭大学

编者附记：《诗集传》、《楚辞章句》均以“四部丛刊”版为底本，并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诗集传》、中华书局《楚辞补注》等多本而成。

诗 集 传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寢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

* “四部丛刊”本原无此序，今据《朱子大全》增补。

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诗集传目录

序.....朱 熹 (1)

诗卷第一

国风一

周南一之一

关雎..... (2)

葛覃..... (3)

卷耳..... (4)

樛木..... (5)

蟋斯..... (5)

桃夭..... (6)

兔置..... (6)

采芣..... (7)

汉广..... (7)

汝坟..... (8)

麟之趾..... (8)

召南一之二

鵲巢..... (9)

采芣..... (10)

草虫..... (10)

采蘋..... (11)

甘棠..... (11)

行露..... (12)

羔羊..... (12)

殷其雷..... (13)

標有梅..... (13)

小星..... (14)

江有汜..... (14)

野有死麋..... (15)

何彼裵矣..... (15)

駉虞..... (16)

诗卷第二

邶一之三

柏舟..... (18)

绿衣..... (19)

燕燕..... (20)

日月..... (20)

终风..... (21)

击鼓..... (22)

凯风..... (23)

雄雉..... (23)

匏有苦叶..... (24)